

唐代文學

論叢

一九八二年 第二期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

论丛

沈嘉海题



一九八二年 第二期

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人民出版社

912788

唐代文学论丛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统一书号: 10094·396 定价: 1.10 元

DZ-49/29

目 录

一九八二年 第二期

诗论文 论研究	1	论杜牧的文学思想(上)	徐中玉
	17	李白的诗论及其艺术实践(下)	乔象钟
作家作 品研究	24	驱神役鬼 鞭撻人间 ——也谈李贺诗中的“仙”与“鬼”	张燕瑾
	32	论杜牧诗	彭菊华
	48	试论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	左云霖
	58	读杜牧的咏史诗	王 南
	68	毫发无遗憾 波澜独老成 ——浅谈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诗	李 谊
	82	柳宗元及其永州山水散文	吴代芳
作 品 赏 析	98	读温庭筠《菩萨蛮》二首	王达津
	104	试说李商隐的《燕台诗》	董乃斌
	117	吞吐山川之气 俯仰家国之情 ——读杜诗《登岳阳楼》	林从龙
	123	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浅说	李云逸
	131	读王建的《宫人斜》	张浩逊
论诗绝句	134	绝句十八首论唐人诗	苏仲翔
诗词今译	150	李白诗三首散绎	傅庚生

百 家 争 鸣	156	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 ——与俞平伯、聂石樵等同志商讨	梁超然 安 旗
	169	《蜀道难》求是	
	189	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 ——读《李白与杜甫》的几点质疑	陈允吉
	208	李商隐《锦瑟》诗众笺评说	周建国
	221	岑参和他的边塞诗之我见	江裕斌
	233	关于高适《燕歌行》的针对性问题	陆凌霄
	242	雁·月黑·大雪 ——和华罗庚先生商榷	张天夫
敦煌文学 研究	246	敦煌曲子词校释（二）	孙艺秋
考 证 · 诠 释	255	考订二则	富寿荪
	261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辨释	刘逸生
	266	《十离诗》辨证	彭云生 遗作
	271	储光羲籍贯考辨	程郁缀
	282	骆宾王生年考辨	骆祥发
	296	王维事迹证补	杨 军
	305	释“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孙琴安
札记与 随 笔	309	读《李白集》札记	朱金城
	325	杜甫和吴郁 ——杜诗札记	黄 英
	330	白居易的琵琶诗	金建民
诗文辑佚	333	王梵志诗拾遗	何文广
作家介绍	337	浅说郑谷	蔺 果

论杜牧的文学思想（上）

~~~~~徐中玉~~~~~

杜牧（803——852）是晚唐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比前人谈得更具体，带有时代的特点；有的曾引起后来不断的争论，值得加以分析研究。在他的文学思想中，我认为不少是符合创作规律，可以作为较好的艺术经验供今天借鉴的。

### 一、文章之用

杜牧是诗人，也是文章家。他这样自我介绍：

某苦心为诗。（《献诗启》）

某少小好为文章。（《上知己文章启》）

某比于流辈，一不及人，至于读书为文，日夜不倦。

（《上安州崔相公启》）

某比于流辈，疏阔庸怠，不知趋向。唯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上刑部崔尚书状》）

他为什么如此爱好写诗作文呢？一个原因是认为“生前不遇于世者，可以通过诗文求言遇，不朽于后世”；“古者，其身不

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也。自两汉已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斯人也，岂求知于当世哉！”（《答庄充书》）这种思想，显然渊源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在“小杜”自己，则还有其具体的遭遇为基础，即他虽出身于高门世族，少年科第，才华亦高，由于思想並不那么保守，不肯逢迎权贵，又有忧国忧民之心，其仕宦是不很得意的。他一辈子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自信确有所见，可是当时牛、李党争正激，他以无所苟合之身，得不到重用，很多有进步意义的改革主张无法实现。因此自然就会想到用诗文来求知于后世，觉得诗文至少还能有这样一种令人慰借的作用。

但这种“求言遇于后世”的作用，在杜牧，毕竟是不不得已的，次要的，他写诗作文，主要求为当世之用，“常欲雪幽冤，于时一裨补。”（《李甘诗》）而且他也不是没有看到诗文以其特有的力量能够对现实生活产生不小的作用。他称引李戡（清吴騞《拜经楼诗话》四，谓戡又名飞）说的话：“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因为是用肯定的语气称引的，也可看为他自己有相同的感受。即认为好诗有助于国俗敦厚，恶诗则能令国俗浇薄。他称赞楚辞的作用，“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李贺集序》）这是说楚辞有了这样重大的内容，对后来一直还很能启发人、激励人。而象李戡

所说：

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见上）

显然这亦是杜牧同意的，他认为“纤艳不逞”的“淫言媠语”，同样能败坏风俗，造成很大的祸害。可见从正反两方面，杜牧对文章的现实作用都看到了的。

正是因为看到了作者即使不遇于世，他的文章对现实生活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杜牧写诗作文的目的仍很明确、坚定，并不仅仅为了想求言遇、求不朽于后世。他对自己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写作目的，清楚地作过这样的表白：

伏以元和功德，凡人尽当歌咏记叙之，故作《燕将录》。往年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艰难来始，卒伍佣役辈多据兵，为天子诸侯，故作《原十六卫》。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故作《与刘司徒书》。处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辈，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处士序》。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有庐终南山下，尝有耕田著书志，故作《望故园赋》。虽未能深窥古人，得与揖让笑言，亦或的分其状貌矣。（《上知己文章启》）

在这些文章中，杜牧多次主张消除藩镇割据，收复河湟失地，巩固国防，实现统一，要求从朝廷内部进行改革。修明政治，任贤授能，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他的《阿房宫赋》，假借秦事，尖锐地揭露了唐敬宗的荒淫无道，对腐败的统治集团提出了尖锐的警告。所谓“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秦始皇这样贪暴，你唐敬宗岂不一样？所谓“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秦始皇后来以及二世面临的形势以及在严重统治危机面前反而愈加骄固不化的独夫态度，你唐敬宗之流岂不一样？那么“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朝如此地迅速的破灭，的确咎由自取，理所当然，即所谓“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唐敬宗之流难道还不该悬崖勒马，吸取教训？这里不仅表现了他对统治集团贪暴的愤恨，实际上也说明了他对人民反抗运动的合理性有一定认识，不能说不是很可贵的思想。他虽有挽救之心，只是唐王朝的末代子孙太不肖，以致没有多久，“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黄巢果然就带领农民起义大军起来沉重地打击了这个王朝，终于促使它很快瓦解了。

杜牧大概也由于他的警告未得重视，没有起到挽救唐王朝的作用而叹息未遇于当世，这当然是奢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这种很可贵的思想难道在客观上对当时人民的反抗运动会毫无有益的影响？《阿房宫赋》里对封建统治阶级腐败集团贪暴政治的揭露与鞭挞，对老百姓痛苦生活的关切与“敢怒”精神的肯定，无疑具有丰富的人民性。杜牧这样做分明是有意为之，要求裨补于时的。他举出的一系列代表作证明他的文学思想既有时代特点，更有显著的进步性。他留传下来的诗文中

自然也有一些无甚意义或值得非议的作品，但这是支流，封建时代作家都存在这种缺点和弱点，而他的进步思想却只是很少的优秀作家、理论家才有。

## 二、儒学影响

杜牧是非常尊崇孔子的。孟子曾说：“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他因而称赞孟子：“称夫子之德，莫如孟子”。韩愈曾说：“天下通祀，唯社稷与夫子，社稷坛而不屋，取异代为配，未若夫子巍然当门，用王者礼，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亲北面而师之。”他因此称赞韩愈：“称夫子之尊，莫如韩吏部。”他说自古以来，称道孔子的人多极了，可是都比不上孟、韩两人称道得这样好。（《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

他曾自豪地宣称：

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上李中丞书》）

儒家谈仁义道德，他也再三强调仁义道德是为学的根本：

万物有丑好，各一姿状分，唯人即不尔，学与不学论。学非探其花，要自拔其根，孝友与诚实，而不忘尔言。根本既深实，柯叶自滋繁。念尔无忽此，期以庆吾门。（《留诲曹师等诗》）

并且也应当是写诗作文的出发点、指导思想。他称赞别人的作

品以此为主要标准：

昨获览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数日在手，读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义而归忠信。（《上宣州高大夫书》）

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阁下以忠孝、文章，立于朝廷。（《与人论谏书》）

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答庄充书》）

他自述写作也以此为旨归：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郡斋独酌》）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政治上，杜牧表现为忧国忧民，很想经邦济世，致君于尧舜一等人物；在个人品德上，表现为刚直不阿，耻当风派人物。例如下列这些传诵的名篇：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同上）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早雁》）

三树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题村舍》）

这些诗篇有的谴责统治集团的荒淫、无知，有的警告统治集团国家即将覆灭，有的忧念北方人民受回鹘统治者侵扰的痛苦，有的把民间的疾苦直接归结为受了“万指侯家”（拥有一千个奴仆之多的封建大官僚家）的巧取豪夺。这也就是他强调“仁义”的主要内容。

至于“道德”的主要内容，其称之为被吐蕃统治奴役压迫下的汉族人民的，是“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永远热爱故土的精神；其称述于自己的遭际和操守的，如说：

“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蹶。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上李中丞书》）这便是一种不管官途如何困蹶，仍要直道而行，甘愿受穷，守道不悔的精神。他如此表白自己的禀性：“仆之所禀，阔略疏易，轻微而忽小，然天与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谄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上池州李使君书》）这段表白颇真

实，他的遭际和诗文都可证明。在当时激烈的牛李党争中，他虽得到过牛僧孺的知遇，但未入牛党；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是他祖父杜佑的僚属，原为世交，可是由于杜牧不肯趋附，被李德裕排挤。他不能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镇的政策，他赞成李德裕讨伐泽潞，抵抗回鹘的主张，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清代王渔洋对杜牧在牛李党争中的表现曾予评论：“星宿罗胸气吐虹，屈蟠兵策画山东，党牛怨李君何与，青史千秋有至公。”（《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这一评论是持平的。杜牧自己的道德表现，在大节方面就是这样。

杜牧的“仁义道德”思想在诗文创作上的以上具体表现，我以为是进步的。可以说，同杜甫《奉先咏怀》，三吏、三别等诗以及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实际上当然这主要是他自己的思想，是在他处的时代生活和社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并非孔、孟之道原来就这个样子，他只是完全按照孔孟之道来思考和行事。但从杜牧的例子，也可看出像过去多年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见“仁义道德”的字样就完全否定，就一律丑诋的做法是多么简单、不合道理。而且就是孔孟的“仁义道德”论，其中当然带着封建性，统治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多少，但它既然曾给包括杜牧在内的人们以启发和某些有益的影响，难道我们对它就断然不可加以分析？须知“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句常言反对的乃是口是心非，口蜜腹剑，而非一古脑儿地反对仁义道德本身。刻薄欺诈，尽管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样，其实还是有些一致的，历史上许多对人狠毒寡恩的家伙至今仍都被公认为坏蛋。那么，在绝大多数场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讲点仁义，讲点诚实，

讲点人格、节操，时代虽变，用意虽有所改，其中某些基本的东西，我们今天不是还颇缺少，还非讲不可吗？杜牧文学思想中存在儒学的影响，对在我国历史发展中长期存在重大影响的儒学“仁义道德”思想，需要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像对待过街老鼠那样，一见就打的时代，早就应该来到了。

### 三、为文之旨

杜牧有段话论为文之旨，非常精采。所谓为文之旨，实际是指创作的基本原则，要正确解决内容（意气）与形式（辞采章句）的关系问题。他是这样主张的：

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风，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闾阖，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答庄充书》）

很清楚，在意、气、辞采、章句四者之中，他是坚决主张以意——思想内容为主导的。“为文以意为主”，前人早已说过了，他的贡献在于很具体地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以意为主”的必要和“意不先立”的弊害。如能以意为主，而且这个意还很“强盛”，则诗文的生气贯注、气势洋溢，辞采章句的雄姿

英发便都有了牢固的基础。苟意不先立，一味讲究辞句，文无宗主，必然散乱不堪。思想内容强盛，文辞愈朴实作品愈高明；如果思想内容低劣，文辞愈华丽作品便愈可鄙。杜牧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明确体会到了内容与形式必须肯定为主与从的关系。

辞采章句虽然是意的兵卫，但不讲究辞采也不行。对此，他认识到：

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答庄充书》）

昨获览三郎秀才新文……其旨意所尚，皆本仁义而归忠信，加以辞彩道茂，皎无尘土。（《上宣州高大夫书》）

这里都只是强调了要意先辞后，不能倒过来，在这前提下，若还能“辞彩道茂”到“皎无尘土”的地步，在他心目中无疑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

不仅如此，他对基本上做到了意先辞后，即使理不甚足，而在辞上有特殊创造的作品，他对这种创造仍是肯定的。他对李贺歌诗的评价即体现了这一点：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陲殿，梗莽丘垤，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李贺集序》）

被后世目为“鬼才”，以为“奇险”的李贺歌诗，由于他“下笔务为劲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序》）过去真能赏识其作品价值的人不多，而杜牧一开始就看出了他的歌诗是“骚之苗裔”，并给予“辞或过之”的高度评价，确有眼光。前面说过，杜牧每以儒学的仁义道德思想衡诗，但他既从骚里看到了“时有以激发人意”的“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的重要内容和进步倾向，又说“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虽以疑问口气出之，实际承认李贺歌诗中也反映有这样的内容和倾向。应该说，他对李贺歌诗的评论相当中肯，而且难能可贵。他在政治上既未与当时的贪暴集团和热衷争权夺利的朋党同流合污，在思想上也并未囿于传统的儒学，排贬包括屈原《离骚》在内的指斥时弊，并采取浪漫主义方法来进行创作的作家作品。杜牧的文学思想在当时文人中可算相当解放了。

杜牧对文学创作本身应有的特点也是很清楚的。特点是什么？用他的话说，便是“优柔”：

武事何骏壮，文理何优柔。（《洛中送冀处士东游》）

这“优柔”，我看其对面即是“激切”、“直陈”。有些政论文由于感情充沛，辞采飞扬，也被承认为文学作品，但绝大多数诗文，总要情景交融。通过形象、境界、抒情来婉曲地表达思想。这种表达方法，由于可以通过感染，使人思考、促人自